

LI SHI DE ZHUAN ZHE ZAI HU BEI LI SHI DE ZHUAN ZHE ZAI HU BEI



陈丕显 著

历史的转折在湖北

历史的转折在湖北

陈丕显 著

中央文献出版社

历史的转折在湖北

作 者/陈丕显
责任编辑/谭德山 王春明
封面设计/谭德山
版式设计/郑 刚

出版发行/中央文献出版社
经 销/新华书店
排 版/北京地质印刷厂
印 刷/北京友谊印刷经营公司

850×1168mm 32开 11.75印张 230千字
1996年10月第1版 1996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4000册(平) 1-1000册(精)
定价:20.00元(平) 定价:27.00元(精)

ISBN 7-101-0343-8/K·119



陳丕顯



1980年7月，陪同邓小平同志视察葛洲坝船闸工地。



1981年10月，在荆州博物馆与李先念、林佳楣同志观看该馆保存的越王勾践的宝剑。



1981年4月，陪同伍修权同志视察咸宁万亩竹园。



1978年8月，在第二汽车厂进行调查
研究。



1979年7月，在黄梅县农村考察棉花生产情况。



1978年5月，到湖北水生生物研究所看望我国著名鱼类学家伍献文同志(右)。



1979年12月，与著名作家徐迟(左二)、著名汉剧演员陈伯华(左一)等同志在一起。

前 言

从1977年7月到1982年9月，我在湖北工作了五年。这一段时间不算长，但却正是我们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实现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的时期。这一伟大的历史转折引导我们告别过去，开辟未来，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上掀开了振兴中华的全新篇章，迎来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回忆这一个伟大历史转折在湖北的足迹，回顾我们在转折过程中的思想认识以及我们在实践中的体会，对于我们深入学习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将会是有帮助的。我的想法得到了湖北省委领导同志的赞同和支持。这就是我这本以“历史的转折在湖北”为主题的回忆录的由来。

建国以后，我长期在上海工作。“文化大革命”这场十年浩劫开始不久，在1967年1月的所谓“一月风暴”中，“四人帮”一手操纵的造反派夺了上海市委的权。从那时起，我即失去自由，过了八年的囚禁生活。1974年10月，在毛主席的直接关怀下，“四人帮”被迫将我释放。1975年1月，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主持党中央、国务院的日常工作后，在

他的干预下，恢复了我的党组织生活，离开了我热爱的、但当时却令我感到窒息的上海，调到中央另行分配工作。但是，我到北京没有几天，形势很快又恶化了。刚刚露出一线转机的中国，又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阴云所笼罩。我住在中央组织部招待所，那里几乎成了一个对老干部集中监护的地方，我的心情没有一天好过。

粉碎“四人帮”不久，1977年1月，我怀着重新出来工作的喜悦心情，根据中央的安排，到云南工作。云南，的确是个十分可爱的地方。大自然赋予她极为优厚的条件，那里居住着勤劳、智慧、勇敢、朴实的各族人民，是祖国大地的一块宝土。我开始了解云南，热爱云南。没想到1977年7月中旬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期间，李先念同志约我谈话，告诉我说：“中央决定把你从云南调到湖北，湖北工作很重要。”这样，我怀着惜别的心情离开仅仅工作了半年的云南，从祖国边疆来到中原腹地湖北。

湖北是个好地方，也确如先念同志所说是个很重要的地方。湖北有数千年的悠久文明史，是对中华民族的发展作出了辉煌贡献的楚文化的中心地区。湖北还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湖北的省会武汉，是辛亥革命首义之地。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从建党到历次革命战争，湖北都作出了重大贡献。湖北山川锦绣，土地肥沃，气候温和，资源丰富，水陆交通便利，有“黄金水道”长江横贯全省，有广阔富饶的江汉平原，还兼有湖乡、丘陵、山区之利，历来是我国粮棉主要产区之一，畜牧、水产、林业等多种经营也有很好的发展条件，素以“鱼米之乡”和

“九省通衢”闻名于全国。解放以来湖北长期是国家重点建设的地区之一，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工业基地和科教基地。1978年在全国的排位中，国民生产总值居第10位，高教与科研居第三位。中央叫我到湖北工作，我感到湖北的条件是很好的，肩膀上的责任也是很重的。

我到湖北工作时，“文化大革命”结束快一年了。原来我们许多人都以为粉碎了“四人帮”，就可以比较顺利地纠正过去的“左”的错误，制订出新时期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了。可是实际情况却并非如此。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虽然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有功，但是他在思想上和工作上仍然继续犯了“左”的错误。他在十一大的政治报告中虽然批判了“四人帮”的反革命罪行，但却仍然完全肯定“文化大革命”的错误理论、政策和口号，甚至说“文化大革命这种性质的政治大革命今后还要进行多次”。很明显，如果让这种“左”的错误继续下去，我们的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仍将遭受挫折和失败，我们的人民仍将生活在困苦之中。所以说，粉碎“四人帮”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但这个胜利只是为实现历史的转折创造了前提。彻底解决拨乱反正的问题，实现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的伟大转折，则是以邓小平同志起核心领导作用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功绩。

作为建国以来我党历史转折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功绩，完全可以同作为民主革命时期我党历史转折点的遵义会议相比拟。这两次历史性的转折，都是在生死存亡、兴衰成败的关头，挽救了我们的党，挽救了我们的革命和

建设事业。这两次历史性的转折，我都亲身经历了。

我是1929年在闽西根据地参加革命的。那一个时期，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红一方面军先后粉碎了国民党的四次“围剿”，江西、福建的革命根据地也发展成为中央苏区，取得了很大胜利。但是，1933年初临时中央迁入中央苏区后便在党、红军和根据地内全面贯彻执行“左”的冒险主义方针，并在组织上采取宗派主义的手段，开展“残酷斗争”和“无情打击”，结果导致了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战争中的失败和中央苏区革命根据地的丧失。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主力被迫撤离中央苏区，向西突围，开始了长征。原来推行“左”倾错误路线的中央领导人这时又犯了退却中的逃跑主义错误，在突围的路上连续遭受惨重损失，短短二三个月内，红军和党中央机关人员从八万多人锐减到三万多人。正是在这个极其危急的关头，1935年1月党中央召开了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问题，批判并纠正了军事上的冒险主义和退却逃跑主义错误，改组了中央领导，在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以后红军好像获得了新的生命，在毛泽东等同志的指挥下英勇而巧妙地冲破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三支红军主力在接近抗日前线的陕北会师，取得了史诗般的长征的伟大胜利。

遵义会议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一个转折点。对此，我是有切身感受的。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时，我只有18岁，担任少共赣南省委书记。

本来我以为会跟随红军主力长征的，没想到领导要我留下来。那时候，留在中央苏区的红军和党政机关工作人员三万多人，统一在中央苏区分局领导下坚持斗争。国民党在调动几十万军队围、追、堵、截长征红军主力的同时，以10余万军队继续包围进攻中央苏区。中共中央苏区分局主要领导人由于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没有采纳把部队分散打游击的正确意见，继续实行“单纯防御”的阵地作战方式，错过了突围的时机。结果我们这3万多人被国民党军队围困在越来越窄小的地区里，濒临被完全消灭的危险。正在这个危急关头，1935年2月中央苏区分局接到中央的两份电报，一份是通报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的情况；一份是指示中央苏区分局在中央苏区周围地区开展游击战争。电报说：“要立即改变你们的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使之与游击战争的环境相适应”；“一般应由中央苏区方式转变为游击方式”。中央苏区分局遵照中央的电报指示精神，才决定将部队分九路向外突围开展游击战争。由于突围过迟，突围中的损失很重。拿我们赣南省党政机关及独立六团这一路突围部队来说，3月4日突围出发时有1800多人，4月上旬到达赣粤边游击区与原来坚持在那里战斗的红军游击队会合时，只剩下80多人，其余都被打散、被俘或在血泊中倒下了。

尽管我们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但是，在尔后的三年游击战争中，在项英、陈毅同志根据遵义会议精神制订的、新的正确方针指导下，保存下来的革命火种继续顽强地燃烧，终成新的燎原之势。各路突围部队分别到达南方八省的目

的地后，都克服了“左”倾错误的影响，粉碎了敌人的“清剿”，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南方八省各革命根据地飘扬起鲜红的旗帜，坚定了人民的信心，在百折不挠的血战中锻炼了一批骨干，保存了自己的力量和阵地，为中国革命作出了重要贡献。长征红军主力是八路军的前身，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则是新四军的前身。可以这样说，没有遵义会议的历史性转折，就没有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没有人民解放军和解放战争的胜利，也就没有新中国。

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历史转折点的遵义会议，引导和保证了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胜利。同样，作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历史转折点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也必将引导和保证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完全胜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16年多的实践所取得的辉煌成就和积累的丰富经验，已经有力地表明了这一点。在邓小平同志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指引下，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从1978年至1994年16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均递增9.8%，居世界之冠；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农民人均收入增长了8倍，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增长了9倍；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我国已成为世界上公认的举足轻重的大国之一。特别是1989年到1991年，社会主义国家遇到了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而我们中国却驶过了惊涛骇浪，更加意气风发地沿着正确的航向奋进。每一个中国人都为此而感到幸福与自豪。我作为一个革命

战争年代的幸存者，“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的过来人，更痛切地感到这一个历史性转折是多么地来之不易！是多么地可贵！

我们湖北省委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并坚决贯彻执行，胜利地完成了“拨乱反正”的历史任务，为湖北进一步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打下了较好的基础。

从1978年至1982年，我们坚决平反冤假错案，全面落实政策，正确处理历史遗留问题（包括“文革”中和“文革”前的），全省解决了20多万人的问题。这项工作的规模之大，解决问题之彻底，在湖北省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这充分体现了我们党光明磊落、有错必纠、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党员、干部和全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积极性，成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强大动力。

我们坚决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同时积极地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不仅使国民经济得到了恢复，而且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82年与1978年相比，国民生产总值增长了46.7%，高于同期全国平均水平；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2.7%，工业总产值增长了67.4%，财政收入增长了16.1%，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了153.7%，城市居民人均生活费收入增长了36.8%；科学、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等事业，也都蓬勃发展。整个建设形势，确实可以说比以往任何一个时期都好。

我们之所以能在湖北实现这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关键

在于我们把全省各级党组织、首先是省委领导集体和各级领导班子的思想，统一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上来，解决了指导思想上的拨乱反正。由于这一次历史性的转折，既要拨林彪、“四人帮”破坏之乱，也要纠正毛泽东同志晚年的错误；既要彻底纠正过去的错误，更要解放思想，开拓创新，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道路，所以在指导思想上（包括在理论、路线和方针、政策上）的拨乱反正是十分深刻的，是很不容易的。回想从“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开始，到传达贯彻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改革开放和四化建设，省委领导集体包括我自己在内，都是经历了一个认识过程的。有的同志认识得快一点、深一点，有的同志认识得慢一点、浅一点；有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认识得好一点、在那个问题上认识得差一点，有的同志在这个问题上认识得差一点、在那个问题上认识得好一点，等等。所有这些情况，我们认为都是符合认识规律的正常现象，特别是在大的历史转折中更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现象。对于这种认识上的问题，我们本着邓小平同志倡导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处理历史问题宜粗不宜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取消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不搞运动”、“拿事实来说话”的精神，强调认真学习，强调调查研究，强调在实践中探索；不搞争论，不搞批判，不追究责任，更不上纲上线、一棍子打死。这样做的结果，大家都在学习、调研、实践的过程中提高了认识，统一了思想，增强了团结。我深深感到在邓小平同志的思想指导下，

这一次历史转折中统一思想的工作，做得非常好。后来邓小平同志说，“不搞争论”是他的一大发明创造。实践也已经充分证明这确实是正确解决党内思想认识问题的一个好方法。

我在湖北工作了五年多，在同志们的支持帮助下做了一点工作，但做得很不够。回想起来，我的工作中确实还有很多不足之处，缺点、毛病也不少。比如，在农业生产责任制问题上思想解放不够，对“大包干”的认识慢了一点；培养选拔年轻干部的工作抓是抓了，但抓得不很紧；在优先发展轻纺工业时，对老企业的技术改造注意不够；在工作作风上，我的脾气有时急躁，要批评就批评，有批评得对的，也有批评得不对或不完全对的，就是批评对了的，有时方式方法也注意不够，等等。这些问题，我在常委的组织生活会上和我临走前的党员负责干部会上作过自我批评，并欢迎同志们继续给我以帮助。

1982年秋天我离开湖北到党中央工作时，正是党的十二大决定改革领导机构和干部制度，实现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时候。我在9月20日召开的省直单位和武汉市党员负责干部大会上传达十二大精神的讲话中，也对这个重要问题作了传达和阐述。中央在十二大前后调整湖北省级领导班子时，就根据这个方针选拔了一批符合“四化”条件的年轻干部充实到省委、省政府的领导班子里来，相应地安排了一批老领导同志从一线退到二线工作。这一个政治体制方面的重大改革，在我党历史上是第一次。湖北省是调整领导班子较早的一个省，调

整的幅度又比较大（拿省委常委来说，退下来的老同志就有8人），我们的工作中也有一些不够细致之处，因此，对我们许多老同志来说，的确存在着思想准备不足、感到不习惯的问题，在思想上和工作上需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但是，这些退下来的老同志都能从大局出发，自觉接受中央的安排，认真做好二线的工作，并且按照中央的要求积极支持新班子的工作，发挥对年轻干部“传、帮、带”的作用，同时新班子也注意了尊重老同志和向老同志学习，从而顺利地实现了新老干部的合作和交替。到现在十几年后来看，离休、退休已经形成制度和新的习惯，领导职务终身制已经废除，保持干部队伍的“四化”已经成了经常性的工作，从而有效地改善和加强了党的领导，保证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当年第一批退下来的老同志功不可没，他们为这一重大改革开了一个好头，树立了好的榜样。

尤其可喜的是1983年以后湖北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取得了新的巨大的成绩。特别是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发表以后，省委抓住机遇，扎实工作，使湖北省的经济建设进入了“快车道”。我现在已经是79岁的老人，从工作岗位上全退下来也已经有几年了。但是，作为一个老共产党员，我的心没有离开过我们党的事业，没有离开过我曾经战斗过、工作过的地方。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我衷心希望湖北省委现在的和今后的领导同志们牢记李先念同志语重心长的嘱托：“湖北工作很重要。”我也坚信，湖北省委一定能团结、带领全省党组织和